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探索和形成

张宏志

[摘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为实现自身的和平发展进行了艰辛的探索。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正确把握时代发展潮流,围绕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确立了以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核心的外交方针,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平发展道路,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国际战略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回顾这条道路的形成历程,深刻理解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必然性和重要意义,正确把握这条道路的发展方向,对于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独立自主;和平发展;道路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73(2014)02-0001-07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为实现自身的和平发展进行了艰辛的探索。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正确把握时代发展潮流,成功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和平发展道路,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我们的和平发展道路来之不易,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经过艰辛探索和不断实践逐步形成的。要深刻理解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必然性和重要意义,正确把握这条道路的发展方向,就必须对这条道路的探索、形成历程,作一个系统的回顾与展望。

一、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对于实现国家和平发展的历史性探索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人民赢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任务突出出来,迫切需要一个有利于自身建设的国际环境。因此,争取世界和平、确保国家安全始终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然而,由于国际环境的不断演变和我们认识上的不断深化,中

国的外交方针也有个不断调整、完善的过程。但是,正像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共产党高举和平的旗帜从未动摇过。为了实现中国的和平发展,我们党作了长期不懈的艰辛探索。

新中国面临的世界格局是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成的。这一时期的国际环境呈现出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两极格局形成,东西方冷战爆发。二战后,世界由战前的诸强并立转变为战后的两雄对峙,加之东西方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上的差异和对立,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出现后形成的恐怖平衡,使这种两极格局固化为长时期的尖锐对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社会主义国家发起了冷战。这种冷战阴云笼罩了全球,制约了世界上其他矛盾的发展演变。二是民族解放运动兴起,旧的殖民体系走向瓦解。二战促进了亚非拉国家被压迫民族人民的觉醒,加速了旧殖民帝国的崩溃,使一大批新兴国家获得了独立,形成了东西方之间广阔的中间地带。这种新兴力量的出现,冲破了旧有的世界秩序,西方列强仅靠坚船利炮和密室外交决定他国命运和攫取世

作者:张宏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界财富的历史一去不返,国家间交流和竞争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然而,由于新兴国家自身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方面存在的弱点和面临的发展困境,使这些国家成为外部势力干涉、控制和争夺的对象。中间地带演变成稳定的两极格局中动荡最为剧烈的地区,成了冷战中的斗争焦点。三是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出现了新变化。二战后,西方国家在经历了初期的一段动荡之后,逐步走向稳定。由于二战后许多新科技成果的广泛应用和政府干预经济作用的加强,西方国家经济发展势头良好。此后,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一些社会改良措施的实施,西方国家出现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经济结构、社会矛盾的新变化,资本的国际流动性加强,经济全球化趋势逐步显现。这一切都表明,二战后的世界与战前相比发生了深刻变化,时代主题开始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变。这些变化正是确立战后国际关系基本走向的依据。然而,由于这些变化从初露端倪到蔚然大观有一个长期发展的进程,国际社会对此认识也有一个从混沌到清晰的过程。

正确判断国际形势,是新中国面临的首要任务之一。早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对二战后的国际形势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毛泽东在二战结束后不久,根据战后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和民族解放、人民民主运动蓬勃兴起的形势,得出了世界矛盾斗争的主要焦点在中间地带,帝国主义在压服中间地带之前不会进攻苏联的结论。由此,他认为中间地带人民的革命斗争不但不会触发世界大战,反而会分散削弱帝国主义的力量,阻止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一判断突破了苏联长期固守的帝国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是世界主要矛盾、新的世界大战是现实主要危险的思维定势。正是基于这一判断,中国共产党勇敢打破了恐美迷信,领导中国人民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和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世界两大阵营冷战的现实出发,为维护人民革命成果、确保国家安全和发展的需要,采取了“一边倒”、“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1](pp.144-145)]等外交方针。这一外交方针,是由中国进行的反帝、反

封建的人民民主革命的性质所决定的,也是符合当时客观实际的,对于巩固新生政权,确保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开启国家工业化建设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的外交思想,可以概括为背靠社会主义阵营,争取中间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大批亚非拉国家获得独立,这一思想获得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一种以社会主义阵营为中心,团结亚非拉新兴国家,争取部分西方国家,建立国际反美统一战线,推进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运动,以世界人民革命的力量制止帝国主义战争的国际战略构想。这一战略构想与苏联方面以美苏较量为中心,强调苏联国家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在国际斗争和世界革命中的决定性作用,要求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和反帝、反殖力量等待和依靠苏联的壮大、服从和配合苏联发展需要的战略构想,发生了冲突。这一冲突引发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激烈论战,最终导致了中苏分裂。中国的这种战略思想,来源于革命战争年代建立国内、国际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相较于苏联那种突出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对立和大国角力的国际战略思想,对于广泛团结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各阶层人民群众,共同开展反帝斗争,具有积极意义。但是,随着世界民族解放运动高潮的结束,发展问题日益突出,单纯以反帝为号召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吸引力和实际作用随之下降。而且,这一战略思想对于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一些新变化缺少足够的认识,在理论上拘泥于列宁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特点的分析,在许多方面已不符合实际。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苏联霸权主义的发展,以及苏联在美苏争霸中转守为攻,中国把苏联定义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认为帝国主义争霸必然导致世界大战,而苏联作为争霸的挑战者,是引发战争的主要威胁。由此,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和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一条线”战略构想。这一理论打破了按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划分世界的传统思维,树立了按世界力量格局和实际扮演的国

际角色划分世界的新视角。这为中国打开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创造了条件。但是,这一理论对于苏联的社会性质作了错误判断,对于战争危险也作了过高的估计,对我国的内政、外交存在负面影响。我国对于和平发展道路的探索,也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

二、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和平发展道路逐步形成

历史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济全球化的态势日渐显著,资本主义国家借助于生产要素的全球化配置获得了较大发展。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所谓“亚洲四小龙”,也抢搭了经济全球化的早班车,实现了经济起飞。以苏联为首的东欧集团,由于僵化的经济体制和沉重的军备负担,经济增长迟缓,在西方的冷战攻势中逐步陷入被动。阿富汗战争失利,更使得苏联在美苏争霸中转为守势。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深刻认识到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探索,随之也对时代问题进行了重新认识。邓小平实事求是地分析国际环境的变化,得出了和平的力量大于战争的力量,世界大战短期不会爆发的结论,进而又提出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主题的重要思想,为实行工作重点转移和改革开放等重大决策提供了理论支撑。与之相适应,中国外交工作的重点也转向为改革开放服务,并相应调整了外交方针,逐步改变了以苏划线的过时作法,在积极与西方国家发展关系的同时,努力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与任何国家建立具有结盟或集团色彩的战略关系,全方位开展对外交往,从而事实上在中、美、苏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制衡的“大三角”关系,为全面对外开放创造了一个有利的战略态势。邓小平的时代判断和他所确定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彻底突破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束缚,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当今世界的新认识,为我们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打开了思路,也为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外交确立了基本方针和思路,奠定了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

理论基础。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内外压力之下,以苏联为首的东欧集团发生剧变,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阵营消失。这使二战结束以后形成的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遇到过的重大国际形势变化。如何应对这一世纪剧变,是中国面临的一场严峻挑战。在这一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12](p.527)}的应对方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实行改革开放,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中国成功渡过这场空前的国际风波、谋求新的发展机遇打开了成功之门。

冷战后的国际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概括地说,可以称之为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矛盾多样化。首先,世界格局向多极化发展。苏东剧变之后,两极格局不复存在,原有的两个超级大国,一个解体后急剧衰弱,另一个也因对立面的消失而失去了自身阵营保护人的地位,控制力下降,世界出现了一超多强的局面,并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单极与多极的矛盾逐步上升。第二,经济全球化陡然加快。冷战的结束,导致世界统一市场的形成,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选择了市场化的发展方向,这与同时兴起的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轮信息革命相呼应,大大加快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也极大改变了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面貌,一些发展中国家抓住机遇趋势崛起,特别是几个发展中大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第三,世界多种类型矛盾逐步显现。冷战结束后,原来受两极格局制约而固化的国际环境出现了松动,一些过去在两种制度、两大阵营对立中被压制、束缚的矛盾冲突开始抬头,由民族、宗教、领土纠纷引发的各类冲突大大增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这些矛盾冲突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部事务,强行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更增加了世界局势的不稳定。世界在保持总体稳定的同时,局部的冲突和动荡有所加剧。这样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对于中国共产党正确判断世界发展趋势,始终在国际竞争中保持主动,提出了尖锐的挑战。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深刻把握世界经济政治的发展方向,审时度势,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判断,指出:世界不稳定因素增多,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改变,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是这一时期国际局势发展的基本态势;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其最终形成是一个漫长、曲折、复杂的过程,单极与多级、称霸与反霸的斗争将成为相当长时期内国际斗争的焦点;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有利于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但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加剧了世界不同国家之间在资金、技术、市场和资源方面的竞争,使广大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处于不利地位;新技术革命正在改变传统生产方式,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正是基于上述判断,中共中央得出了我国正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结论,牢牢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继续推进改革开放,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先后作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对外开放,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制定“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开放战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重大决策,使中国在历史变迁的关键时刻,抓住了难得的发展机遇,闯出了一片新天地。

在这一历史时期,我们进一步明确中国外交的根本目标是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为此,我国坚持了改革开放以来外交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思路,并且创造性地发展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一方面,坚决顶住外来压力和干涉,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捍卫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尊严;另一方面,正确处理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关系,站在完全独立自主的立场上,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灵活应对国际事务。这一时期,中国提出了积极推动世界多极化,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尊重世界多样性,正确引导经济全球化,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

为核心的新安全观等一系列重要主张,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争取了话语权,改变了冷战结束初期的外交被动地位。

这一阶段的中国外交,呈现出几个突出的特点,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冷战后中国外交的总体布局。

第一,着力运筹大国关系。冷战结束之后,世界格局失衡,重构大国关系对于稳定世界局势有着重大意义,而重建中美关系尤其重要。两极格局解体后,中、美、苏“大三角”的战略制衡关系消失,中美之间战略共同利益下降,意识形态矛盾上升,双边关系趋于复杂。然而,由于冷战后世界矛盾的复杂化,两国间仍有利益的汇集点。特别是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和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两国之间在经济上有着广泛的互补性,这就使得中国方面有了继续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基础。中方从战略高度把握两国关系,采取了扩大双方利益汇合点、灵活应对矛盾分歧、妥善管控各类冲突的方针,在坚持捍卫中国根本利益的基础上,确保了中美关系总体上的稳定,进而也对构建冷战后新的国际战略格局作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中国也积极发展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大力开展经济文化交流,特别是与俄罗斯建立了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战略伙伴关系。这些方面的努力,对于扩大我国战略回旋余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倡导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也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大国利益格局的发展变化,积极开展大国外交,不断调整与各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在我国外交全局中仍居于关键地位。

第二,深化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大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也随之兴起,亚太地区经济发展势头和合作需求尤为强劲。我国地处亚太中心位置,具有与亚太不同地区国家全方位开展区域合作的有利天然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形成了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也为进一步开展与周边国家的合作打下了基础。这都为我国深化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我国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以相互

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为基础,以互利合作、共同发展为主轴,建立了多种不同方向、不同层次的地区合作机制,全面发展了与周边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关系。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些努力对于建立良好的地缘战略态势,打破西方敌对势力孤立、包围中国的图谋,促进地区经济融合和共同发展;对于推动国内经济建设,加快边疆地区发展,粉碎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渗透,都具有重大意义。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与周边国家在利益上的更多融合或碰撞,周边国家外交的重要性必将更加突出。

第三,创新发展中国家外交。由于共同的历史遭遇和现实处境,广大发展中国家与中国利益相同、立场相近。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一向是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然而,随着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凸显,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发展民族经济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因此,我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那种以制衡大国争霸、反对侵略战争为主要内容的国际统战关系,失去了存在的条件;改变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争取平等的政治经济权益特别是发展权益,成为我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追求。我国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工作,也创新了工作思路,一方面,我们继续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反对以推行西方价值观为口号的新干涉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利益;另一方面,我们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南南合作,努力发展互利共赢的双边、多边关系。在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中,我国逐步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国际统一战线思想,这就是不由我们出面组织或当头,不针对特定国家或国家集团,在一定国际场合,针对某种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行为,自然形成一种联合行动。实践证明,在经贸、环境、人权等领域的国际论坛上,发展中国家基于共同立场而形成的自然联合,发挥了重大作用,初步改变了少数发达国家一手垄断国际事务的状况。我国得以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多次粉碎西方涉华提案,正是得益于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

这种新型统一战线。近年来,随着一些发展中大国的迅速崛起,发展中国家外交的重大作用将会愈加显著。积极开展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对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对于争取友好国家支持、提高中国国际地位,对于扩大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国家长远发展利益,仍具有基础性的战略意义。

第四,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冷战结束之后,多边国际组织和协调机制蓬勃发展。这一方面是由于两极格局的终结,缓和了国际冲突,使多边外交活动得以摆脱两极的束缚,获得较大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是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使全球治理问题日益突出,需迫切建立新的沟通协调渠道。这一趋势对于制约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促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具有重要意义。在冷战时期,由于当时的大多数多边国际组织分别受制于两个超级大国,有的甚至沦为超级大国争霸的工具,因此,我国对于某些多边外交活动保持一定距离。冷战结束后,我国迅速抓住了多边外交的新趋势,积极参加多种多边国际组织和协调机制,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亚欧首脑会议、东亚峰会、二十国集团等,大力宣传中国主张,主动引导国际舆论,为打破西方国家对国际事务的垄断,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国际话语权,解决全球治理难题,发挥了重大作用,也为缓解我国面临的国际政治经济压力、扩大战略空间,作出了重要贡献。除此之外,我国还在公共外交领域开展了新的探索,抓住时机创立了博鳌亚洲论坛,为世界搭建了一个不受西方控制的公共外交新平台。随着全球治理问题的日益突出和中国国际作用的不断增强,多边外交作为中国外交重要舞台的作用会愈加明显。

上述四个特点,表明冷战后的中国外交与冷战时期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冷战时期的外交,仍带有某种军事斗争的色彩,突出国家安全利益,采用的是类似革命战争年代统一战线的斗争策略,在首先划分敌我友的前提下,联合最大多数的力量,孤立和反对最主要的威胁。无论是先前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一边倒”战略,还是后来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条线”战

略,都具有某种“直线型”外交的特点。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呈现出互有攻守的相持局面,战争危险明显下降,我国又实行全方位外交的方针,这就把“直线”外交发展成为“环型”外交,但这种外交仍具有传统外交的“线性”和“平面化”的痕迹。冷战结束之后,世界矛盾趋于复杂化、多样化,国家之间利益与冲突相互交织,综合国力比拼成为国际竞争的主要手段,国家的发展利益越来越重要。形势的这种变化,要求多层次、多角度、多渠道开展外交工作,“线性”和“平面化”外交已不能适应需要,以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和多边外交为主干的“网状”外交应运而生,逐步形成了以“大国为关键、周边为首要、发展中国家为基础、多边外交为重要舞台”的外交总体布局,使外交工作呈现出一种“立体化”的新格局。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深入发展,外交中的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等因素不断增长,中国的外交格局将越来越丰富多彩,越来越向“立体化”方向发展。

进入21世纪之后,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世界形势又呈现出一些新的阶段性特点,经济全球化引发的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许多结构性的深层次矛盾逐步显现。西方发达国家相对实力下降,内部矛盾上升;新兴发展中大国呈集体崛起势头,但也进入了痛苦的转型期;世界力量格局处于新的大变动、大调整的前夕,冷战后的国际关系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国家间竞争更趋激烈,国际局势中不确定因素上升,全球治理问题日益突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围绕这一问题的冲突也日渐增多。西方国家内部保护主义、排外主义倾向抬头,一方面积极谋求借助先进技术实现再工业化和制造业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逆向转移;另一方面操纵国际议题,干涉发展中国家内部事务,大力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经济危机,以求巩固自身的优势地位。这一切使经济全球化进程出现曲折,国际环境趋于严峻。而恰在这一时期,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国经济也全面融入世界,这使得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

的变化。中国日益走向强大,而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疑虑也更加强烈;中国的利益范围向世界扩展,涉及的矛盾和冲突也在增多;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相互摩擦也有所增加。特别是美国实行战略重点东移,推行所谓亚太再平衡战略,遏华色彩明显,推动中国周边环境恶化。这一切使得中国外交必须迎接一场新的挑战。

面对新的形势变化,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作出了积极的应对。首先,透过纷繁复杂的国际现象,正确判断世界发展趋势的主流,得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在深入发展,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日益紧密;我国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但机遇仍大于挑战。正是在这一判断的基础上,中国进一步深化外交工作基本方针和总体布局,高举起科学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发展的旗帜,实行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努力构筑总体稳定、相对均衡、合作共赢的大国关系框架,坚持贯彻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积极参与和引导发展中大国合作,充分运用多边外交手段和多边机制,主动提出关于全球治理问题的主张,倡导建立和谐世界,以切实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这一系列外交方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表明中国更加积极地走向世界,更加主动地参与全球治理,更加充分地展示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和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推动全球治理模式的创新。

我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发展,表明中国外交已日臻成熟,为自身的和平发展开辟了一条成功的道路。这同时也预示,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我国同世界之间已形成了密不可分的相互联系。我国只有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外交方针,才能更好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国家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习近平强调,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是我们党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我国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这就抓住了中国的国际战略核心。

三、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探索 历程带来的几点启示

回顾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探索的历程,可以从其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历史中得出一条基本结论,就是中国所开创的这条和平发展道路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下去。而这条道路的探索过程留给我们的几点启示,需要我们在今后的继续探索中引以为鉴。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始终以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为根本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100多年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不懈追求,也是中国共产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中国外交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为实现民族复兴创造有利条件。因此,无论是革命胜利初期,为了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侵略威胁,捍卫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或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中国外交始终围绕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服务于国家安全和发 展大局。

第二,始终高举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一个和平的发展环境,需要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因此,无论是在反帝、反殖斗争中支持亚非拉国家民族解放运动,还是在冷战格局中建立反帝、反霸统一战线,或是在冷战结束后确立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外交政策的根本宗旨,中国的外交始终把防止战争、维护和

平、争取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侵略扩张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放在首要地位。

第三,始终注意把握世界发展趋势,灵活调整外交策略。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要求我们必须准确把握世界大势,顺应发展潮流,不断调整外交策略。因此,无论是两极对立格局下的“一边倒”、“一条线”或“大三角”,还是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时代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和多边外交的四位一体,中国外交始终注意分析判断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时调整政策策略,力争保持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动权。

总之,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际战略思想和外交方针政策,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围绕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确立了以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核心的外交方针,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平发展道路,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国际战略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学习、借鉴和不断丰富、发展这些精神财富,对于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2]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云 尔

Exploration and Formation of 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 Path: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our country has carried on the difficult exploration to realize its own peaceful development. Entering the new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our country properly grasp the develop trend of times, according to the overall goal of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ve established the foreign policy with the core policy of independence and peace, walked out a peaceful development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med a complete set of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 becoming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ocialist pat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oretical system. Comprehensively reviewing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the path, deeply understanding the inevitability and significance of 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 path, correctly grasping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path, has the very vital significance in further promoting the caus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and realizing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nd the great revival of the Chinese nation. (ZHANG Hong-zhi)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of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ory — Alerting to the “Three Weak Aspects” and “The Five Characteristics” Problems of Ecological Civilized Research: At present, there exists “three weak aspects” in our academia's research on ecological civilized problem: except for a few Marxists, the Marxist research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relatively weak; research of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fundamental theory is relatively weak; the directionality and strategic research of building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re relatively weak, forming the situation of “beautiful mess.” There are not a few results of “pseudo- theory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emi-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ory,” which mainly shows as “the five characteristics,” namely westernization, labeling, utilitarian, vulgarization and alienation. (LIU Si-hua)

Comprehensively and Accurately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rket and Government: Market determines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is a general rule of the market economy, but the socialist economies determine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is not the rule of the market value, there are plans to develop a pro-rata rule; you need to look the decisive role of market and the better playing role of government as an organic whole. Not only using the excellent function of market regulation to inhibit “state regulation failure,” but also using the excellent functional state regulation to correct “market regulation failure,” to form efficient market that is strong and efficient government market, that is “double high” or “double strong” pattern of strong government. The direction of reform toward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is the unity of the economy and politics.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is a complete concept, cannot be fragmented. There is no country does not have the macro-control, but not exactly the same size and intensity. The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the ideological work are not two parallel things, some ideology and economic work have the close cross relations,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economic construction itself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of ideology. Neo-liberal economic model is an economic ideology of international monopoly bourgeoisie. In theory, “economy right politics left” is a pair of contradictory concept. In politics, we should both hold high Marxism-Leninism, Mao Zedong Thoughts, and much hold high Deng Xiaoping Theory, “Three Represents” Thoughts, and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in economy, we should not only adopt “market economy,” but also adopt “socialism.” On both sides of the politics and economy straightened up, has drawn the dividing line with the so-called “economy left politics” argument. (LIU Guo-guang, CHENG En-fu)

The Inner Logic Behind “In Resource Allocation the Market Should Play the Decisive Role and Government Should Take an Active Role”: Since the 14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though the wording may be different, the economic policy has been that “In resource allocation the market should play the decisive role.” *The Decision on Major Issues Concerning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s* made in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mandated that “decisive role” substitute “essential role,” and put forward the important theoretical thesis that “In resource allocation the market should play the decisive role and government should take an active role.” The common view among the academia with regard to this thesis is that “those within the capacity of the market should be left to the market,” which can be taken as specious nonsense. We would like to express the view that the decisive role of the market is conditioned, and the intersection of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is not clear-cut, but rather inextricably related, which is